

# 宗教与经济的张力

——评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耶儒对话讨论会

The Tens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Economy: A  
Review of the Forum of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ue  
Based on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沈 路

SHEN Lu

## 作者简介

沈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SHEN L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Design Art of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Email: shenlu1987@163.com

## Abstract

The Institute for Ethics and Religions Studi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held a forum of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ue based on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Professor Chen Ming and Professor Chin Ken pa took part as keynote speakers, and a number of scholars with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backgrounds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The discussion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two speakers' views reflected two positions in current Weberian research: those following Weber's Model and those departing from Weber's Model. Professor Chin analyzed the tensions in Puritan belief implied by Weber's proposition, and argued that this tension of belief had a dynamic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fessor Chen reminded the audience that scholars should note Weber's ideological background—as a German imperialist, liberalist and nationalist in writing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He stressed that returning to Weber's living context would stimulate contemporary scholars' sense of mission. During the discussion, participants had very meaningful debate about whether a community could break away from Weber's Model and what the China model was. Scholars we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what the model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actually showed in today's China.

**Keywords:** Weber's model, culture and economy,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ension,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ue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必然面临一些瓶颈，在寻求出路和答案的过程中，韦伯著作也随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恰逢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兴起，由于社会转型的需要和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复苏，从而引起了中国学界对韦伯研究的热潮。在韦伯的著作中对中国学人影响最广的当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该书从文化史的角度试图解答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问题。这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凡讨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常会套用此书思路或受之影响，此种做法常被称为“韦伯模式”。正如辅仁大学曾庆豹教授所言：“任何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现象都可以套用韦伯模式”。

当下中国，同样经历了经济的崛起和飞跃，基于中国经济的腾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刺激中国经济腾飞的文化动力又在哪里？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是否也有本土文化因素的影响？2019年10月11号在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开展了一场以中西文化与经济关系为主题，基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著作研究的耶儒文化对谈，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次论坛由陈明教授（湘潭大学）与曾庆豹教授（辅仁大学）为主发言人，同时谢文郁教授（山东大学）、瞿旭彤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许家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郁喆隽博士（复旦大学）、唐文明（清华大学）等诸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

## 一、韦伯模式：从天职观到预选论——资本主义的滥觞

曾庆豹教授先对大陆韦伯研究的学术史做了简要的回顾，随之对韦伯思路进行了简要说明。曾庆豹教授认为韦伯在“新教”和“资本主义”这两个看似悖离和两极化的事物上找到了微妙的联系点——路

德的天职观。韦伯的命题推导方式正是基于路德的职业观而产生的层层涟漪。曾教授从路德的天职观入手先对韦伯模式进行了概括，演绎了韦伯如何从路德的天职观到加尔文的预选论再到理性化，进而导致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曾教授强调：加尔文预选论中隐含着基督徒生存中的信仰张力，这一张力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核心动力。

曾庆豹教授认为在韦伯的论述思路中有两个关键主题，分别是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选论。

### 1.路德的“天职观”

关于路德的天职观，他认为路德在翻译中引入“天职”（calling）的概念，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在新教改革中，路德最大的贡献就是圣经翻译，曾教授认为路德的翻译直接影响了整个德文思想。路德的圣经翻译引起韦伯关注的地方在于路德引入天职概念后，就改变了传统宗教中圣、俗二分的对立局面。在传统宗教中宗教事工是圣事，世俗工作是俗事，而路德把“工作”翻译为带有神圣意味，具有“呼召”情感的词汇，就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圣事和俗事的界限，弱化了圣、俗之间的阶级差异。将“职业”翻译成“天职”，不仅在信仰上打破了宗教垄断的概念，在生活上也模糊了传统宗教中教士阶级与俗世阶层之间的距离和差异。参与俗世工作与教士一样来自于神的呼召，不再具有低贱的、物质的、世俗色彩。天职概念的出现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摒弃天主教将道德诫命区分为‘命令’（praecepta）与‘劝告’（consilia）的做法，转而认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世俗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个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sup>①</sup>

---

<sup>①</sup>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Max Weber, *Xinjiao lun li yu zi ben zhu yi jing shen*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KANG Le & JIAN Huime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54.]

曾教授认为，我们在理解路德提出的“人人皆祭司”口号时，在考虑到宗教角色平等的层面时，也应考虑到路德的职业观。在职业方面也是“人人皆祭司”：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人在任何一份有利于社会的工作中都能承载祭司的功能。路德的职业观随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近至影响了德国民众的身份自觉，发动了德国的农业革命，远至对加尔文宗教伦理思想的影响，继而影响了整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产生。

然而，路德虽提出了天职观，而他的职业观并不是对传统宗教的颠覆，在韦伯看来路德的职业观还是偏向传统主义，虽然天职概念对圣、俗二分的对立状态进行了调和，肯定了工作的平等性，但路德仍坚持要绝对的服从于上帝的权柄，对工作的态度强调要安于现状。路德的职业观深受保罗淡漠世俗名利的思想影响，认为职业是指“人将之视为神的旨意而甘愿接收且‘顺从’的事”<sup>①</sup>，不鼓励换取更好地工作，或者从事多份工作。世俗工作虽然不低于修士生活，也并不鼓励在世俗工作上多下功夫，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这种观念经过加尔文的进一步演化后，引导新教改革在职业伦理论问题上走向宣扬圣、俗合一观念。

## 2. “预选说”中的信仰张力

路德所做的努力为加尔文新教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职业观方面，路德仅证明了世俗职业的合乎神意性，而加尔文在此基础上证明了人在尘世中通过世俗职业增添上帝荣耀的必要性。在加尔文宗看来，神为人类的便利创造了有秩序的世界和有组织化的社会，那么为了社会利益服务的劳动显然也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也成为加尔文宗的职业伦理的鲜明特色。

加尔文的职业伦理观虽来源于路德，却与路德同途殊归。路德虽调和了圣、俗的差异，但在职业观上与传统主义没有本质差别，而加

---

<sup>①</sup>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第62页。

尔文则完全背弃了传统主义的职业观，在世俗化的路上走的更远。加尔文如何从路德演化出了不同的职业伦理，其转折的关键点在于他的预选论。

曾庆豹教授在此处重点强调了预选论带给新教徒信仰生活的张力。正是此张力最终导致了加尔文宗的理性化新教职业伦理。根据“预选论”的思路，人是绝对的堕落，上帝有绝对的主权预先就无条件的选择一部分人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宠，得到恩宠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能得到这一恩宠；任何人为的方式都无法获得恩宠。那么，基于这样的前提，新教信仰中的张力则表现为：对于完全堕落的人来说，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选民身份，只有凭着信心去相信自己已被预选，“唯有被拣选的人能在心灵上了解神的话语”<sup>①</sup>。同时，由于信心的强弱不定和其不可见性，人又需要凭借着可见的“上帝恩宠状态”去确认自己的选民身份。在职业伦理上的表现就是：信徒只劳动，不享乐，以证明自己恩宠在握。其内在逻辑在于：加尔文宗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荣耀上帝的行为，唯有选民才能做天职从而荣耀上帝，所以劳动变成了印证“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加尔文在信仰生活中排除了路德神秘主义的方式，认为只有理性化的信仰方式才确实可靠，主张从世俗生活中去印证个人信仰状态。信徒只有将自己当做是成就上帝旨意的工具，在生活中合乎理性地安排整个道德生活，在工作中呈现出与上帝合一的状态（即在工作上获得上帝的祝福），从而就能确信自己的选民身份。这正是禁欲主义的典型特点。

加尔文宗认为整个尘世的存在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基督徒的世俗生活则是荣耀上帝的具体方式，所以在所有世俗活动上都应荣耀上帝，包括职业。所以，以清教徒为代表的禁欲主义者努力在职业中获取财富荣耀上帝，在生活中杜绝世俗享乐，当消费的限制与获

---

<sup>①</sup>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第83页。

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成就了理性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生活方式。这一思路不仅导致了加尔文宗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理性主义，而且又进一步导致了世俗的功利主义。

### 3. 韦伯对儒家（儒教）与新教的比较

最后曾庆豹教授简述了韦伯对儒家（儒教）的看法，以便于“耶儒对话”主题的进一步展开。总体说来，韦伯认为，新教的理性化信仰方式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世界其他宗教都具有神秘主义传统，所以具有神秘主义传统的宗教文化都无法影响经济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模式。而儒家（儒教）不同于其他宗教，他也具有理性化特征，但由于它跟现实社会的适应性特征，不具有新教徒信仰中的张力因素，张力是造就改变的动力性因素，所以新教徒由于信仰生活中呈现出的张力——动力，从而呈现出支配世界的行动，改变了社会发展的方向，造就了近代资本主义。而儒家（儒教）更强调对社会的适应，因而在中国也没有出现近代资本主义，从而反证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核心观点：近代西欧的物质繁荣是新教伦理所带来的特殊现象，在其他文明中都不存在。

## 二、跳出韦伯模式：基于韦伯的西方叙事和生存语境的思考

在陈明教授的发言环节，陈教授并没有接续韦伯命题中的信仰张力问题，以及儒家与经济关系的问题展开进一步深入的讨论，而是试图解构韦伯的知识神话，呼吁学界要摆脱韦伯讨论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叙事模式，重构韦伯写作时的生存关切，强调韦伯写作时作为德国的帝国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生存事实，认为关注韦伯的生存语境对当代学者使命感的激发更具意义。

### 1. 解构韦伯的知识模式

陈明教授开宗明义道：“关于韦伯的讨论首先要跳出韦伯对经济



文化之关系的讨论模式”。他认为，中国宗教文化有自身的持续性特征，中国文明也有其自身所特有的内在构成形式。就如杨庆堃先生所持的观点：韦伯将中国民间信仰看作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这种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基督教世界的模式为参照物来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现象的结果<sup>①</sup>；现代中国学者仍认为中国社会非宗教的论点也是受了西方宗教观的直接影响<sup>②</sup>。看待中国宗教问题不可直接套用西方宗教概念。杨庆堃教授用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来区分对待中国复杂多元的宗教形式，认为“在中国形式上有组织的宗教不够强大，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功能价值或宗教结构体系的缺乏。”<sup>③</sup>陈明教授以杨庆堃先生的观点为依据，即：中国宗教不同于西方宗教有着正式的组织性体系和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特点，认为，如同讨论中国宗教不能套用西方模式一样，也不可套用韦伯模式（新教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去讨论儒家（儒教）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在陈明教授看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虽然造就了一种知识神话，使得如今学界凡讨论“经济—文化”就绕不开韦伯模式，但其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套文化解释，如同马克思从意识的必然性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一样。此书只是具有叙事特征的学理说明。陈明教授认为造成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有市场运行的法则。韦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他本人宗教文化影响的预设为先，其论证思路是通过社会现象倒追原因的勾连，从而产生的学术探

---

<sup>①</sup>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5页。[C.K.YANG, *Zhongguo she hui zhong de zong jiao*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trans. FAN Lizhu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7), 35.]

<sup>②</sup> 同上，第22页。“现代中国学者在极大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社会非宗教的论点。”该论点先是由西方学者如理雅各（Legge）、翟理斯（Giles）、布德（Derk Budde）等人所持守。

<sup>③</sup> 同上，第35页。



讨。陈明认为，这种论证方式不免有“先射箭，后画靶”的嫌疑。

## 2. 韦伯反向论证的不足之处

陈明教授承认韦伯把人作为灵性的、意志的、主观的文化存在和社会存在来展开讨论的价值。他认为韦伯的价值不在于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而在于在文化中对人的作用和人的行为与世界关系的探讨。韦伯对儒教的研究是把儒教看作是其他文明中的宗教作为反例来论证他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韦伯不自信的表现。当然，陈明教授提到，这种反向例证的形式又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即文化比较，这也是韦伯的学术贡献。这种文化比较也刺激了各个宗教的自觉反思，纷纷开始从自身的宗教文化着手去讨论与经济的关联性。以韦伯思路而展开的儒学研究有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为代表，同时还有曾庆豹教授的《从传统寻找“现代性”——儒学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新马来人思潮与文化霸权》等著作。

然而，陈明教授认为，韦伯将儒家作为反例进行论证时，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及汉学文献的缺失，对儒家的理解尚有偏颇。其具体表现为韦伯对先秦儒学与宋明儒学的区别没有感知，韦伯对儒家关于“天”的认识也缺乏感受，所以韦伯只能从伦理学的角度去解释儒家的问题。由于韦伯身在异国对儒家研究的新材料无法获得，所以韦伯只看到了儒家的理性化特点，却对儒家理性的伦理化认识不够，从而没有关注到儒家关于“德行”的理性伦理化特征。

由于韦伯掌握儒家文献的不足及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感受，陈明教授认为韦伯关于儒家对资本主义排斥性的反例论证并不充分。所以，陈明教授强调，关注韦伯命题就要关注到他写作时的生存语境，认清他写作的初衷是为德国民族和德国的发展进行论证。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他作为德国人的西方中心论的目的，而不应在他的文化叙事上过多留恋。

## 3. 还原韦伯的生存关切

陈明教授一再强调经济有经济的规律，有市场的法则，资本主义

的形成有诸多的原因。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韦伯写作的处境，而不是把韦伯的文化叙事方式供为神话。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要跳出韦伯的叙事模式，直接进入他的“性命”——更多关注到韦伯作为一个德国人在西方世界的非西方性的边缘焦虑。这对我们当今学者更有意义。中国当代正需要像韦伯这样的思想者，我们也正处于和韦伯相似的时代，同样需要按着中国国情提供一套符合中国文化和处境的方法。若把韦伯置于当下中国的生存语境，面临中国经济腾飞的现象需要提供一套文化解读的话，他肯定不会给出如同新教伦理一样的解释方法。我们要看到韦伯为自己国家边缘化的焦虑，以及韦伯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的写作身份。

但是，至于当今学者该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现象的文化关联？摆脱韦伯模式后用“自己的路子”解释现状的路径又是什么？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陈明教授尚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论证。

### 三、跳出韦伯模式何以可能？

随后的讨论环节，诸位与会学者就儒家的超越型、儒家的承载者和儒士生存中的张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试图去解答摆脱韦伯模式何以可能的问题。在激烈的讨论中逐步呈现出三种路径：

第一种方式就是陈明教授所提出的重视韦伯写作初衷而不做过多学理论证的方式，试图强调学者的民族情怀而忽略“新教-资本主义”之间的学理分析的方式，以此来实现对韦伯知识模式的跳脱。根据陈明教授的论证，当我们在讨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时候，似乎都还是在韦伯模式之中。包括余英时先生的著作看起来是对韦伯的反驳，是对韦伯对儒家不理解的申辩。但是，这种论证还是在韦伯模式之下，似乎当我们在讨论文化与经济之关系的时候，就无法摆脱韦伯模式。陈明认为，应该更注重韦伯著作中人与世界的关系，过滤掉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追究他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在文化里面对

人的作用的关注，肯定人的行为与世界的关系；至于资本主义，则是偶然性的。包括在解释儒士的生存张力时，陈明更多讨论的是人对他者，及人对世界的张力关系，比如，韦伯的焦虑来自他与德国，德国与世界的生存关系。

对于这一方式很多学者并不认同。与会学者瞿旭彤认为，韦伯作为一个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他不仅仅只是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其真正目的是要去改变，正如陈明教授所说“韦伯即有对宗教的拒斥又有对宗教的肯定”。韦伯在一边“祛魅”的同时也在不断“加魅”。又如陈明所讲的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也是在不断“祛魅”同时“加魅”的过程。中国的儒家圣人传统和西方宗教传统虽不相同，不能按西方宗教框架来理解儒家，但两种文化从文明延续的角度来讲，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同陈明教授所言，我们现在需要按照我们的情况解释当下的事实处境，该处境虽与韦伯时代的事实处境不同，但韦伯的解释方法或许对我们有帮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可能完全置韦伯的知识模式于不顾。

谢文郁教授进一步补充道：韦伯关注到的基督徒信仰中的张力其实正是“圣-俗”之间的张力。在新教中由于“天职”概念的引入，一个从事世俗工作的人既是圣者（选民）又是俗士（从事世俗活动的人），且选民身份需要世俗活动来加以确认。那么，在新教徒信仰中就会有“圣-俗”两种力量的拉扯，正是这种在一个信徒身上的两种相互拉扯的“圣-俗”张力促使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而在儒家文化中，是否同样存在这样的张力？儒家也区分君子和小人，如同前新教时代一样有“圣-俗”的差别。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赚钱方面君子和小人相对立。在儒商群体的生存中是不是也打破了“圣-俗”二分的模式？儒商的生存中是否也存在如同新教徒一样的“圣-俗”张力？

由此，第二条路径在谢文郁教授的发言中逐渐清晰起来：关注生存张力，通过对比新教徒与儒生的生存张力的认识，走出自己的模

式。谢文郁认为，韦伯提到的张力问题是导致经济发展走向的关键问题，只有把张力问题演算清晰，才能真的走出韦伯模式。在韦伯的论证中，新教徒信仰中的“圣-俗”张力产生了资本积累进而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不过，此张力进一步发展，理性化无限扩张后，却导致了另一困境：使资本主义进入铁笼状态。而在这个铁笼中新教精神却已经逃走，如韦伯所说：“宗教的根基逐渐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现实执著所取代。”<sup>①</sup>那么，我们讨论的关键就是要专注新教信仰中的张力。如果对这个个体张力没有进行充分讨论的话，就会沦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讨论。个体内部的动力性张力会直接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儒家文化中是否有同样的张力——可以作为新的动力把经济引入另一条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牢笼”的路。只有摆脱了资本主义牢笼，才算真正摆脱韦伯模式。不然，我们就只有跟着“西方模式”继续发展。

儒家学者许家星对于儒家的张力问题进行了回应，认为儒家虽然是“圣-俗”两分的，但又是“圣-俗”一体的。儒家学说中强调“士”的使命是仁道，至于谋利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对于百姓来说，需要给予一定利益引导，正如孔子所说“庶之富之教之”的次序，有其逻辑安排在其中。然而，儒学同时又强调内外一体，即：神圣与世俗的当下一体性。如《中庸》里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对于儒家致力于道的人来说，圣、俗之间的对立感不像基督教如此之强。关于儒家与基督教的挣钱观念，许家星也指出：对新教而言，挣钱是目的，而对于儒家来说挣钱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谋生，这一点与新教有本质不同。

根据许老师的回应，儒家对于“圣-俗”的观念犹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一个世界”，在社会分层上有圣、俗的区分，在求“道”过程中是合二为一的存在。由于在儒生的生存中“圣-俗”的张力并不

---

<sup>①</sup>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80页。

像新教徒的“圣-俗”张力有一个时间性的过程演变，即：先由“圣-俗对立”发展到“圣-俗融于一体”的过程。加之儒士对金钱追求的淡漠性，儒家伦理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落入资本主义牢笼，似乎缺少个体生存中的动力性张力。所以，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文化因素究竟是什么？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特殊性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儒家学者仍未给出更好的答案。

曾庆豹教授提出了第三种路径：延续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曾庆豹认为，在之前的讨论中似乎存在一种现象：规避新教伦理就没办法与韦伯开展对话，没办法跳出韦伯模式。新马克思主义对韦伯的讨论则是一种接续了韦伯的结论，但又不触及新教的一种方式。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即受到韦伯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却不陷于对新教伦理的探讨。他们接收韦伯“价值理性正逐渐为工具理性所取代”的观点，认为批判理性正逐渐为工具理性所取代。工具理性所导致的文化是一种手段文化，而不是一种目的文化。从而导致注重实现结果的方式，而不是该结果本身的社会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从韦伯的结论开始，继续讨论，而不是从韦伯的问题开始。郁喆隽教授也在此观点上进一步论述了自韦伯之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第二次断裂现象。这样的路径虽然既可以规避新教也可以不讨论儒学，但这又好像违背了探讨当代经济—文化之互动关系的初衷。

总结一下。陈明教授一再强调关注韦伯的个体生存，不去关注韦伯所讨论的新教徒的生存张力及其与资本主义之关系。他所推举的杨庆堃先生在阅读韦伯时，也关注到了基督徒的生存张力，并提出“儒者没有驱使他根据上帝的道德命令来改造世界的这种感情上的紧张性”<sup>①</sup>问题。他同时也认可了韦伯的问题意识，认为韦伯对中国宗教

---

<sup>①</sup>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Max Weber, *Zhongguo de zong jiao: ru jiao yu dao jiao*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 KANG Le & JIAN Huime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350.]

文化与经济的陈述虽不完美，没能给人一个满意的回答，但该问题仍有价值，需要进一步解决。

其实，讨论韦伯模式与脱离韦伯模式实质上并无冲突，讨论韦伯模式是为了走出韦伯模式。这正如谢文郁教授所说：今天讨论新教伦理中的张力就是为了寻找我们文化中可以获得改变社会的力量在哪里？不同文化动因会影响经济发展不同的发展方向，新教动因最后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牢笼，我国市场经济背后的文化动因是什么，能不能帮助走出牢笼。不跟着西方模式走向工具理性的道路，是本次讨论的主要目的。

因此，完全脱离韦伯模式似乎并不可能，因为韦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无可回避思考的命题，如今学界也需要解答这个命题。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功能问题的讨论，以及宗教与相关联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研究都是由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首次提出，并用以佐证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著作中的观点。所以韦伯作为学术史的源头，注定成为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全然摆脱韦伯模式绝无可能，但我们可以他的问题意识里去寻找更精准的答案。当然，关于中国经济背后的文化动力是复杂而交融的，如同中国文化从晋代开始就开启儒、释、道三者交融一般，难以如西方宗教一样有如此清晰的边界。所以，讨论中国经济背后的文化动力乃是一个大课题，一次学术讨论不可能将所有问题全部穷尽。正如杨庆堃先生所说：“韦伯的陈述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够精确，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于那些有意于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作范文化比较的人，仍然是个新鲜的挑战。”<sup>①</sup>今天这个挑战依然存在。

---

<sup>①</sup>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第349页。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Weber, Max. *Xin jiao lun li yu zi ben zhu yi jing shen*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KANG Le, JIAN Huime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Weber, Max. *Zhongguo de zong jiao: ru jiao yu dao jiao*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lated by KANG Le, JIAN Huime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YANG, C. K. *Zhongguo she hui zhong de zong jiao*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Translated by FAN Lizhu.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7.]